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胜利观

■智 楠 许 炎

引言

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能打胜仗是军队存在的根本意识和价值所在。新时代赋予了我军新的使命任务,科学认识和把握胜利观的新时代内涵,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军军事斗争准备针对性,也为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打赢未来战争提供了新的视角。

探究胜利的基本属性

人们谈论胜利,往往将胜利的评判局限在某维度,如唯国家利益至上说、唯经济利益得失说、唯有力力量消灭说和唯政治目的达成说等,然而,胜利与否具有多重内在属性。

胜利的多样性。胜利具有多重意义和标准,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个维度。在政治方面,战争胜利与战争政治目的具有统一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只有政治目的的达成,才意味着战争胜利的到来;在军事方面,胜利必须以一定的军事胜利为基础,军事作战的胜势只为战争的胜利提供前提基础;在经济方面,战争的胜利意味着经济或物质层面有所得,“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最高境界;在外交方面,胜利能够打出军威、国威,特别是持久胜利换来的长期和平环境,为国家长远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价值。

胜利的演进性。胜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尤其是对应战争形态演变而产生新的内涵。冷兵器至机械化时代,土地是社会生产的基本资料,战争的胜利往往以歼敌夺地为主要标志,征服领地成为工业化时代战争胜利的核心;信息化时代中,传统物质资源在生产生活中的比重逐步降低,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精神因素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精神上摧毁和控制更加凸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化社会及战争形态逐步来临,胜利内涵必将发生新的变化。

胜利的辩证性。从战争整体上看,胜利主体具有辩证性,战争双方是一对典型的攻防对抗矛盾关系,与生俱来就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胜利,某一方的胜利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在胜败转换辩证性上,骄兵必败、哀兵必胜,胜利方如果不能防止骄傲,就

很容易在下一场战争中遭遇失利而转为失败,反之,失败方如果忍辱负重就有可能赢得下一场胜利;在胜败时空辩证性上,持久或短暂、全局或局部的胜利具有不同意义,暂时的、局部的胜利往往潜藏失败危机,只有将短暂局部的胜利转化为持久全局的胜利,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胜利的价值和意义。

胜利的基础性。“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赢得战争胜利的基本前提是军事作战的胜利,它为转化成最终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根本基础。没有军事行动的胜利,就没有其它胜利的前提基础。军队为打仗而生、为打赢而建,其核心是能打胜仗。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军队担负的任务不同,但作为战斗队的根本职能没有变,能打胜仗的根本要求没有变。军事上胜利是一切胜利的根本出发点,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误解和动摇。

认知胜利的时代要义

胜利有多重属性评判标准,最核心的就是军队是否有效履行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新时代,我们要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要求,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四个战略支撑”的使命任务,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巩固执政党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重要力量保证,既是我军性质宗旨的根本体现,也是对军队提出的新要求。特别是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倘若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党的旗帜下,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政治安全,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把初心和使命落实到本职岗位上、一言一行中。

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胜利就是要以有效履行军事行动、达成作战胜势为基本前提条件,要求我们慑止和抵抗侵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维护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的关键阶段,安全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显著增强。特别是主权、统一、领土完整问题是国家核心利益,涉及到复杂的历史纠葛、地缘政治,蕴含着重大政治、外交、贸易、军事风险。这些问题绕不开、躲不过,是赢得胜利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应严密防范各类蚕食、渗透、破坏和袭扰活动,坚决保卫边防、海防、空防安全,必要时敢于通过以战止战、控制战局、赢得战争来捍卫国家统一。

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胜利就是要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重要标准,要求我们维护海外经济安全。我国战略利益不断向海外延伸,商贸人员与资产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安全保障就必须跟进到哪里,特别是当前海外经济利益安全问题凸显,国际和地区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等构成现实威胁。我们应积极推动国际安全和军事合作,着力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实施海上护航,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遂行海外撤侨、海上维权等行动,有效确保海外利益安全。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胜利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人类日益成为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日益复杂的外交环境,特别是地区秩序主导权之争、规则之争、发展道路之争带来的突出矛盾,我们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正确义利观,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促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配合、互补合作,营造平等互信、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积极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把握胜利的实践要求

胜利是在军事博弈中取得。军事手段是实现伟大梦想的保底手段,我们要充分遵循战争指导规律,在军事实践中确保军事行动与政治、外交、舆论等相配合,有效实现正义必胜、和平必胜和人民必胜。

军事上有力。建设同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推动机械化信息化融合发展,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构建我军特色的现代作战体系,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强化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断提高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能力。

政治上有理。军事作战胜利为政治胜利提供坚实基础,就要以国家战略牵引军事战略,以军事战略服务支撑国家战略。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特别是当今时代,战争舆论高度透明,军事行动要与舆论法律斗争密切配合,抢占政治、道义和法律的制高点,为战争胜利奠定扎实的道义基础和价值依托。

发展上有利。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更好维护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伟大复兴进程不被延缓或打断。当今世界,战争胜利的关联因素显著增多,复杂性不断增强,呈现出混合战争的特点。军事作战行动,应密切配合政治安全、经济利益、贸易互惠和外交主动等方面,紧紧围绕维护好实现好国家利益进行战略运筹。

行动上有序。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要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中进攻相统一。

【延伸阅读】参见本版往期文章《应有怎样的战争观》(2018/12/20)《应有怎样的力量观》(2019/8/20)《应有怎样的优势观》(2019/8/29)《应有怎样的制权观》(2019/9/17)《应有怎样的作战观》(2019/9/24)

群策集

当今世界科技正酝酿着新的突破,以人机大战为标志,人工智能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并加速向军事领域发展,这必将对战争形态产生冲击甚至颠覆性影响。因此,我军必须加快推进军事智能化建设,加速锻造智能化军队。

创建智能化理论。创建智能化战争基础理论,深入研究智能化战争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战争指导、作战样式、攻防行动、制胜机理、特点规律等内容;不断创新智能化战争的战法,如智能集群战、精确秒杀战、认知控制战、智能伏击战等;研究掌握智能化战争的技术基础理论,包括高复杂战场环境的感知与理解、人机协同作战的人机混合智能等。这些理论是智能化战争理论体系的基石。未来以“算法中心战”为核心的战争理论,极有可能取代以“网络中心战”为核心的战争理论。

重塑智能化形态。军队组织是联结军事技术和作战理论的纽带,是发挥军队整体作战效能的杠杆。在未来智能化战争中,伴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军队组织的发展趋势,将按照领导管理体制“全域分布式、网络矩阵式”、作战指挥体制“算法支撑、人机融合”、规模结构“小型灵巧、模块集群”、力量编成“军种融合军民一体、传统部队为主体、智能部队为骨干的无人化、自适应”方向建设发展。未来智能化战争的体制编制将按战略、战役、战术不同层次和不同军兵种,组建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小型多能智能化新型联合作战部队。

发展智能化武器。应着眼智能化战争体系作战和智能化武器装备体系建设的需要,搞好顶层设计和整体统筹,编制智能化武器装备体系发展路线图,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地研制高中低端、大中小型、远中近程、覆盖陆、海、空、天和网络等空间领域,作战与保障相配套的智能化无人作战装备体系,增强各军兵种和作战、保障等各种智能化武器装备的体系融合度。与此同时,应着眼无人和反无人、智能与反智能作战需要,注重研发反敌智能化无人作战的武器装备系统,确保能够有效地与敌进行智能化无人攻防对抗。

创新智能化训练。当前,智能化作战理念、作战方式不断更新,训练模式由“机械+信息”主导型向“智能+”主导型转变。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创设更加“真实”的武器操作体验和战场环境,能够逼真演绎作战进程、辅助决策指挥、评估作战构想。探索智能化训练新模式,提升智能化作战能力,将成为未来练兵备战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将智能化战争和无人化作战纳入训练大纲,常态化开展训练。

培养智能化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是加强国家智能化基础建设的根本。智能化战争具有复杂性、超前性、类人化等特点,存在作战指挥去中心化、作战过程去分工化、人才结构去分层化、技

加速推进军事智能化

■李明海

能操作高端化、工作方式研究化、前沿与后方模糊化等特点,相应地也要求智能化军事人才具有人才群体性、技能精准性、知识复合性、思维创新性、决策智能性等特点。因此,建设智能化军队,打赢智能化战争,首要是要拥有一大批人工智能领域的专门技术人才和指挥人才。

深化智能化融合。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是应对智能化战争威胁和挑战的“国之重器”。在智能时代的浪潮中,要重点在以下颠覆性技术上取得融合突破:围绕算法支撑发展海量情报信息智能数据挖掘技术、智能规划技术;围绕机器主战发展智能芯片技术、自主无人系统技术;围绕智能决策发展可解释高可信辅助决策技术、人机交互与智能融合技术;围绕极限作战发展智能集群作战协同技术、能量与信息智能对抗技术。因此,军事智能化核心技术的研究,不仅要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协作创新,还要使社会智能化与军事智能化发展对接并轨,借鉴社会智能化发展成熟技术和成功经验,大力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动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嵌入作战要素、作战流程。

管窥外军反恐准备

■曾庆华 李丽华

外军纵横

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复杂,特别是恐怖活动的军事化特征突出。俄美等国都通过加强军队反恐作战准备提升反恐能力。

完善法律法规,做到“师出有名”。军队介入反恐行动需具备法律支持。俄美等国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军队遂行反恐行动的法律基础、法律地位、法律空间,明确军队平时参与执勤巡逻、战时参与打击行动的基本原则、职能定位、程序方法。如:俄罗斯的《紧急状态法》《反恐主义法》,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军队对内反恐职能。

加强理论研究,做到“指导实战”。针对恐怖分子“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一跑就难以追踪”的特点,俄美等国都注重研究恐怖袭击的特点规律和反恐战略战术,明确反恐作战指导思想、作战原则,建立完善指挥体系、作战编成,以便有效应对。如:美军颁布新版联合出版物JP3-26《反恐主义》,提出在军事行动范畴内联合反恐作战理论。

优化力量编成,做到“灵活善变”。恐怖袭击越发呈现出袭击手段多样化、袭击目标随机性等特征。俄美等国在防范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以小制小,以快制快”,根据作战任务灵活对作战力量“积木式”组合搭配,根据执行具体反恐任务,对部队进行灵活

编成,再配属必要专业处置分队(如核生化处置分队等),形成最优作战编成。

强化针对训练,做到“因敌制胜”。军队遂行反恐行动,一般包括封控、打击、救援三个阶段。在封控、救援时,可由普通部队完成;而打击时,则需要选调特种部队,以达成“突击攻坚”目的。俄美等国特种部队成员都要求具备良好的突击技能、丰富战斗经验、非凡耐力体能,通常从现役部队中挑选训练水平高、心理素质好的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年轻士兵,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技、战术训练。

推进装备建设,做到“先利其器”。鉴于反恐行动的特殊性,俄美等国军队的特种部队除配备本国常用武器外,还配备一些诸如拐弯枪、机器人等多样化、多功能的世界先进的反恐作战武器装备,以满足遂行反恐作战的多方面需要。如:法国总是将防护、通讯、枪械、交通工具等最先进反恐武器装备最先配发给国家宪兵特勤队等特种部队。

搞好军地协作,做到“整体制胜”。俄美等国基本上都健全完善了军地联合反恐机制,建立反恐指挥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情报信息共享,通过群众举报等方式及时获取涉恐情报信息;建立反恐联动机制,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做好情报研判会商,便于军队提前预置兵力,做好防范应对;适时组织联合反恐演习,不断强化执行反恐行动时的军地协作能力、反应能力。

智能化作战指挥形态有啥特点

■胡剑文 王克强

观点争鸣

人类正从信息时代走向更高级的智能时代,拉开了智能化战争的序幕。在作战指挥领域,由于技术手段不同,作战样式上有着质的差别,因此不同时代在作战指挥形态上也存在根本的区别。进入智能时代后,作战指挥形态将会在指挥活动、指挥决策、指挥体制三个方面呈现不一样的景观。

指挥活动从以信息为联接纽带变为以知识为联接纽带。战场空间通常可以用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来刻画。硬件平台存在于物理域;信息主要存在于信息域,而知识作为一种可信的、用于决策和指导行动的方法手段,则存在于认知域。如果工业时代作战样式是以硬件平台为核心,信息时代则对应以网络信息为核心纽带,那么智能时代将要迎接一种新的样式:以知识为核心纽带,整个作战行动将围绕着知识的生成、共享与运用展开。在信息时代,各平台间联系更为密切,信息交互频繁,指挥人员可以通过整个网络获取高质量的有用信息,各个作战平台的效能成倍提高,信息已成为兵力效能的倍增器,并成为战场核心要素。然而未来战争规模更加宏大,协同更加复杂,行动更为迅速,

只是信息的充分共享,已经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克敌制胜仅有信息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知识的优势,有着知识优势的一方才能达成行动优势。近些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管理技术、云使能技术以及高性能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作为信息高阶形态的知识,逐步已像传统信息一样在网络中共享、转换、提炼、合成,未来的战场不仅能做到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而且能实现基于知识的指控决策的互联互通与协同。直接指导行动的知识替代一般性的情报将成为协同各种作战力量发挥最大效能的倍增器。在以知识为纽带的作战指挥模式中,各种作战力量将极大地减小OODA(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周期时延,OODA过程的质量也会得到空前提高,战场作战力量将具有前所未有的高效能。

指挥决策从计算机辅助式变为人机融合的“作战指挥脑”模式。信息时代的指挥信息系统是辅助指挥决策人员的重要支撑,已成为作战力量效能的倍增器。其主要功能是信息收集、查询管理、传递处理、辅助决策等,对指挥员的作战指挥有很强的辅助性,是一种人脑的外部工具。未来智能化作战的指挥系统将在现在的指挥信息系统上得到升华,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智能化,是一种综合集成模式的智能

系统,将成为人脑的外延,并与人脑融为一体形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脑”。随着战场超高速物联网的建成,空间距离将彻底贬值,这样基于效能的整体智能。形式上虽分布,但效能却是聚焦的。作战指挥将基于大量历史数据,作战原则以及自身推演实验的信息,运用综合智能集成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学习,迭代形成作战指挥人员强大的外脑。它能够根据战场态势动态地提供指挥决策信息知识,而不只是简单应答式处理。指挥参谋人员成为整个指挥脑的一部分,在整个“指挥大脑”中发挥着人类特有的且机器难以替代的智慧,这是钱学森提出的人机融合的大成智慧的具体实现。这也对指挥参谋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辅助决策模式跃升到人机一体的融合模式中,更要善于融入到“指挥大脑”中,提高指挥效能。

指挥体制从固定层级模式变为柔性集成模式。未来作战力量将会根据具体任务使命动态联合,各种作战力量的指挥机构集成为虚拟的“指挥大脑”与“智能云”,指挥体制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例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当侦察监视部队发现目标,信息传到指挥脑中,信息处理部队利用信息

与知识优势迅速分析判明目标情况,相应的信息知识再发到指挥脑中,作战任务部队据此展开高效作战推演实验,得出有效的应对手段,并通过指挥脑发送到一线作战部队,以消灭敌方目标。整个作战过程中,各作战力量将具有高度自主性,自协同地高效完成作战任务,智能化作战指挥体制具有高度弹性的去中心化结构,传统严格层级的指挥体制将会被打破。在新的智能化作战指挥体制中,将会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作战态势,面向任务动态组合的作战单元,动态、柔性、集成地构建指挥拓扑结构;依据战场中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层级以及任务使命,而不是直接按行政等级来确定指挥权限与决策权重;作战指挥体制将更加扁平化,各作战单元实现动态自适应式指挥控制协同,指挥控制效能将会极大提高。因此,面向未来智能化作战,应牢固树立联合与体系意识,深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改革,实现各军兵种作战力量的深度融合与一体化,避免军兵种的条块分割影响作战指挥效能的发挥,切实提高未来智能化战争的战场管理能力。

胜负先胜而后求战。随着加快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深化创新发展作战指挥体制,加强适应智能化战争的高素质指挥人才的培养,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未来智能化战争。